

傳播、評論與教研

文學傳播現象

◎孟 樊

壹、前言

甫於八十四年十一月榮獲第八屆梁實秋散文獎首獎的青年作家林耀德，不幸在剛跨過該年的年關後，於八十五年元月八日猝逝，噩耗傳出後，震驚了兩岸三地。林耀德的死，在冷颼颼的嚴冬裏，為即將來臨的鼠年，揭開了台灣文壇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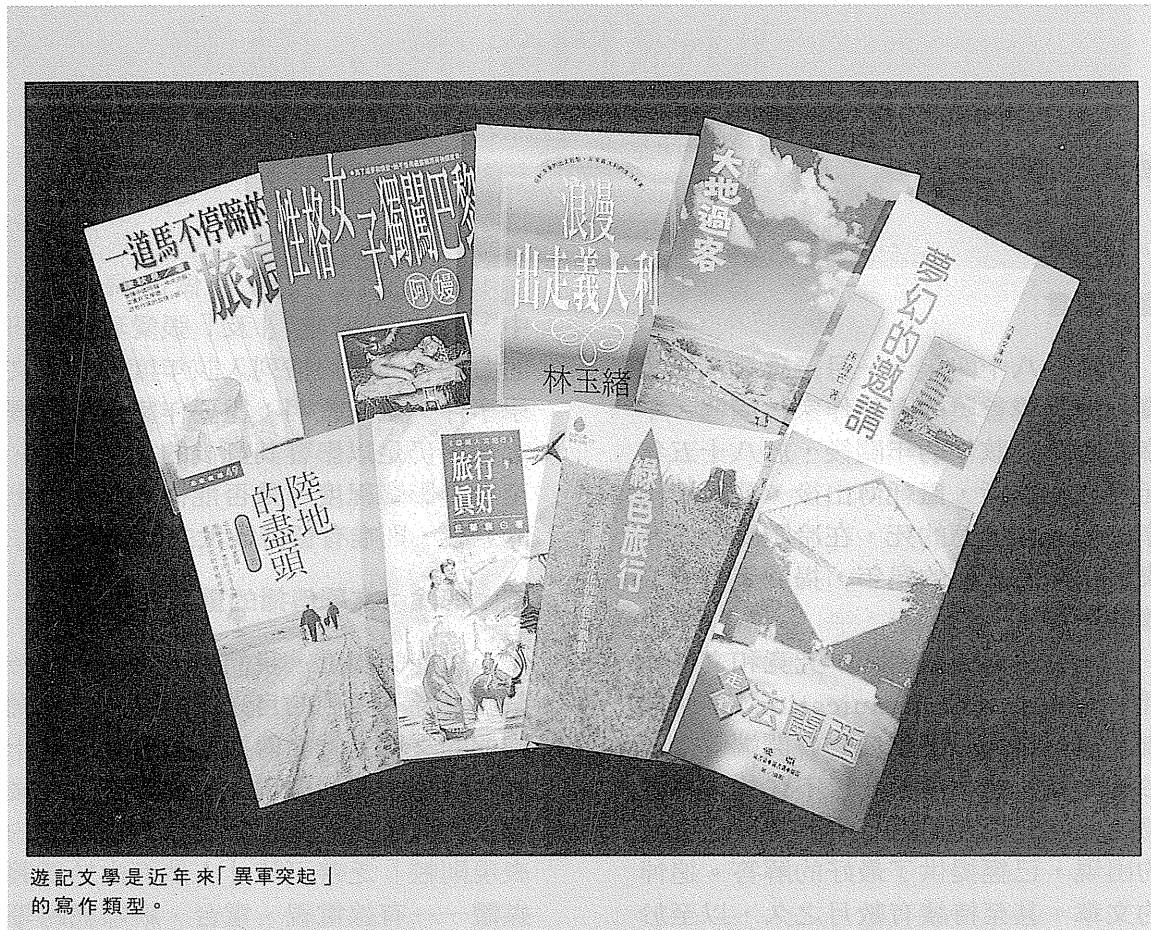
一位青年作家的死，究竟和文學傳播(literature communication)有何關係，值得作為一個年度的「開端」？關於這一點，在林耀德死後不久的傳播媒體上，如「雪片紛飛」的各種悼念文章的出現，已經提供了最好的解答。追悼的文章，甚至持續有數月之久，以至於到了翌年年初，中國青年寫作協會還為他辦了一場作品的研討會。這情形如同八十四年九月過世的張愛玲一樣，直至隔年，不僅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出面主辦了一場場面盛大的「張愛玲國際研討會」，八十五年一開始的元月份，且由詩報與書泉分別出版了張子靜的《我的姊姊張愛玲》及張健的《張愛玲新論》，加上皇冠出版的《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一書，以及為數不少斷斷續續出現的文章，讓八十五年上半年的台灣文壇，清晰可見寂寞芳魂與少年英魂飄然走過的步履。

在《文訊雜誌》所做的調查研究中，「林耀德猝逝」及「張愛玲國際研討會的召開」均被列入該年度的十大文學事件，足資證明：重要作家撒手人寰之後，仍足以影響其身後的文學傳播。至於其影響程度，是否能構成文學史上的意義，則唯有留待後世去檢證了。

貳、總論：文學傳播的重要現象

鬼魂的國度，我們生人難測，焚香祭禱之餘，我們的目光還是要放在熱鬧絢爛的文壇上。從傳播的角度看，八十五年台灣文壇的表現，主力仍然放在文學書的出版上，文學雜誌及報紙副刊的表現則較「乏善可陳」；然而由於新興媒體——有線電視、電台、網際網路等的崛起，使得文學傳播的生態也起了若干的變化，對於台灣文學的發展具有相當的意義，值得吾人注意。

整體而言，首先在著作出版上，具有市場魅力的通俗性作品（主要是散文及小說），仍舊是一般書店及讀者的最愛，以金石堂書店所做的「八十五年度暢銷新書排行榜」為例，在前五十名的文學類書籍中，除了排名四十四的張大春的《撒謊的信徒》一書係屬純文學創作外，其餘進榜的可說概屬通俗文學作品，如劉墉的《我不是教你詐2》（第三名）、小彤的《親愛的看招》（第三



遊記文學是近年來「異軍突起」的寫作類型。

十一名)、吳淡如的《尋找初戀情人》(第三十四名)和《於是假裝不在乎》(第三十五名)、林萃芬的《只想多愛你一點》(第四十六名)……顯見純文學創作要擠進暢銷書排行榜並不容易。

由於皇冠文學出版公司在年初推出其主辦的第一屆「皇冠大眾小說獎」五本入圍作品(陳漱意的《上帝是我們的主宰》、張國立的《佔領龐克希爾號》、張永琛的《混血兒》、杜修蘭的《逆女》以及李寅羊的《布達佩斯紅寶石》),對於通俗文學的推行頗有推波

助瀾之功,尤其在鼓勵創作優秀的通俗文學方面,皇冠此舉不無向日本「直木賞」(以鼓勵、倡導創作優秀的通俗文學為目的)看齊以至於互別苗頭的意味。通俗文學在書市上聲勢雖然浩大但向來不為評論家所喜,更少見其擲地有聲的書評,皇冠設立此一「大眾小說獎」,對於多數通俗文學作家來說,不啻是一「利多」的消息,有很大的鼓勵作用。

此外,在文學出版上值得令人關注的還有三種類型文學,一是遊記——這

年來國人出國旅遊風氣之盛，衆所皆知，聲名亦遠播國外，很多作家也酷愛旅行，整個大環境都直接間接鼓舞了遊記文學的「異軍突起」，遊記的出版與閱讀，從來就未曾受到出版商及讀者這樣的青睞。二是歷史小說及傳記——此一以歷史及人物為背景和主角的文類，或多或少是受到解嚴以後熾熱的政治的影響，不論是為競選宣傳或派系鬥爭，政治人物紛紛以出版傳記為樂，擬藉此達到造勢或打擊異己的目的，渡假使得傳記的主角也擴及其他非政治性人物，甚至向歷史借鑑，在這方面，遠流早幾年推出的「實用歷史叢書」，向來即有很好的口碑（只是它不是歷史小說的創作）。三是同性戀文學——隨著近幾年高張的女性主義的「橫行霸道」，除在集體作戰上常常和它站在同一陣線的同性戀團體，繼前些年端出《女朋友》、《同言無忌》等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同仁雜誌外，同性戀作家在八十五年的表現，更是讓人有目共睹，許佑生的一本《男婚男嫁》便搶盡了風頭，輿論為此曾喧騰一時。

其次是如前所述「乏善可陳」的文學雜誌及報紙副刊的表現。「乏善可陳」這四個字或許有人不同意，的確，一些前衛性的文學佳作（如新詩、小說）事實上都先在諸如《聯合文學》、

《中外文學》等雜誌發表，而且像《文訊月刊》還舉辦過「台灣出版文學研討會」，中央日報副刊也主辦了一場盛大的「百年來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其活動力似未見僵滯、衰退，也依然如往年一樣，繼續推陳出新。然而，總的來說，文學雜誌仍舊是「小眾化」，甚至有萎縮的現象，《誠品閱讀》（雖非純文學雜誌）就於四月間「下台一鞠躬」，因為銷路問題被迫停刊。更嚴重的是，兩大晚報聯合晚報（當代版）及中時晚報（時代版）副刊的喊停，這兩大副刊從報禁解除之後創刊以來，將近有十年的時間，培養了不少文學好手，雖然其間數度有傳出被「腰斬」的消息，但最後總能「苟延殘喘」留了下來，想不到它們的壽命竟然撐不到一九九七香港回歸大陸的日子。

再次是文學傳播途徑有了新的變化。如前所述，近幾年由於新興傳媒的「熱鬧滾滾」，例如有線電視台的出現、新設電台的競爭、家用電腦的普及及其網際網路的盛行，文學傳播的途徑大為擴增，作家不僅可以上電視、電台「打書」，還可以主持與書（文學）有關的節目，如蔡康永在TVBS主持的「翻書觸電王」；蔣勳在警廣主持的「文化廣場」；張香華同在警廣主持的「詩的小語」；朱秀娟在復興主持的

「唸小說給你聽」……不論是散文、小說、新詩，都可以藉由不同的聲光媒體呈現出來，向多數的讀者招手。更新鮮有趣的是，年輕詩人同好還可在電子網路上辦詩刊、搞創作，另闢蹊徑，以與主流文學媒體抗衡。

底下我們進一步分析上述這些文學傳播現象的意義。

參、分論

一、通俗文學

通俗文學或大眾文學長久以來一直是書市的常勝軍，由於其「有利可圖」，背後有功利的因素在作祟，久而久之，導致其版圖逐漸向原有的純文學領域侵蝕，也即通俗文學作品的出版量愈來愈大，相對地，純文學作品的出版量便越來越小，加上連鎖書店暢銷書排行榜的炒作，使得以往我們所認識的「文學」本身，面目全非，「文學」的定義也要重新改寫，尤其在年輕讀者（所謂「新新人類」）身上，他們心目中的文學和老一輩讀者所認為的文學，其涵義和指涉的對象可能都不一樣。

更大的影響尚不僅於此。由於通俗文學的讀者眾多，加上市場魅力，致使不少純文學作家跟著改絃易轍，紛紛「下海」，改寫大眾小說或通俗散文，其中能經營有成者也不在少數，例如苦

苓、小野等即是。純文學作家愈來愈少的結果，純文學作品的產量自然跟著降低，然後再衍生出一種畸型的現象，此即文壇老是只有那幾張老面孔，作品具經常是換湯不換藥，此種情形在三大報（中央、中時、聯合）文學獎的得獎者身上最為明顯。三大報文學獎在不禁「已得過獎的成名作家競逐下，早已失去獎掖新人的意義，錦上添花的事情有人做，文學薪火相傳的苦差沒人幹，新人要在成名作家前冒出頭並不容易。在通俗文學的蠶食鯨吞下，結果我們的文壇是「一潭死水」。

在這種追逐讀者的動機下，前所遺皇冠所主辦的「大眾小說獎」，以及新學社設置的「羅貫中歷史小說獎」（歷史小說一般也被歸為大眾或通俗小說森林）就別具意義。詳言之，在純文學領域已呈「一潭死水」難以恢復昔日美好景觀的情形下，不如把通俗文學「叫好」，反而來得有意義些，讓通俗文學作品既能叫座也能叫好，蓋向來台灣即缺乏「好的通俗文學作品」，因而鼓勵通俗文學作家寫些優秀的作品有其必要，杜修蘭的《逆女》及楊書案的《孫子》分別在「大眾小說獎」與「羅貫中歷史小說獎」中掄元，儘管仍有異聲，但總算向「叫好」的方向邁出了一步。與此同時，前輩作家段彩華也跟

繳出一本別出心裁的武俠小說《清明上河圖》，值得注意。

二、旅遊文學

旅遊文學指的其實就是「文學性的遊記」。

在旅遊風氣還未盛行前，遊記一向便是被人忽略的一個次文類(sub-genre)，出版遊記簡直是燒冷灶，對出版商而言幾乎無利可圖；當然，或也因從事遊記創作的作家不多，所以更難見到「偉大的遊記」作品。在此之前，三毛幾乎便是遊記作家的代表。近幾年之間在旅遊風氣大開後竟然一下子冒出了好多位遊記作家，如劉克襄、歐銀釧、徐仁修、師瓊瑜……讀者雖不踴躍，但也不抱持冷漠，影響所及，連一些向來從不寫遊記的小說家、散文家、詩人，也開始寫將起來，涉足旅遊的天地，如孫瑋芒、愛亞、隱地等。

八十五年中這種旅遊文學書非常搶手，如阿嫻的《性格女子獨闖巴黎》、林玉緒的《浪漫出走義大利》、陳凌的《邂逅，夏日巴黎》、丘榮襄的《旅行，真好》、愛亞的《走看法蘭西》……其中有散文亦有小說創作，類別頗為可觀。這些旅遊文學作品，地點清一色都在國外，好像國內旅遊不值得記述或創作。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書，或被

此間文壇人士視為旅遊文學的代表作，自八十一年出版以來即成為暢銷的長銷書，在八十五年行將結束之前的十天，他本人親自受邀來台訪問，在作者直接面對讀者的相互交流之下，使得該書掀起另一波的熱賣高潮，為該年度旅遊文學的表現畫下了一個美好的句點。

三、歷史小說及傳記文學

歷史小說在台灣向來擁有其固定的讀者羣，儘管為數不多；其中高陽的魅力最大，很多人認識歷史小說，都是從他開始的，即連南宮博也有他的讀者羣。不過，歷史小說終究是一個冷門的文類，出版量並不多，直至最近幾年才熱門起來。八十五年實學社主辦了第一屆「羅貫中歷史小說獎」則可從兩點來看：一是這表示歷史小說在台灣已有蓬勃的發展，是到設獎競賽的時候了；二是它可以鼓舞歷史小說的創作者，寫出更好的歷史小說。可惜，首二獎的得主均為大陸作者（楊書案的《莊子》及王順鎮的《長河落日》）。

傳記小說從另一方面看也可算是歷史小說的一種，蓋傳記本身就是一項歷史，如前所述，近幾年傳記書走紅，影響所及，傳記小說也跟著水漲船高，從平路的《行道天涯》以孫中山為本事的傳記小說造成話題開始，傳記就成了若干作家的「最愛」，八十五年張大春便

衆握手，還進一步請他們來作客，供出園地，讓「全民（一起來）寫作」，於是「大眾所寫的文學」也就東一塊西一塊地登堂入室。

本來副刊的園地，就是向大眾開放的，誰都可以自由投稿，副刊並沒有向誰壟斷，今天卻來提倡「大眾文學」，鼓勵「全民寫作」，不是有點弔詭嗎？事實上，副刊向來只買成名（小牌也算）作家的賬，名不見經傳的「小老百姓」是很難登副刊這大雅之堂的；想不到十年風水輪流轉，大眾逐漸抬頭（連大眾Call in的電話都可以出成「口水書」上市了），作家只好割讓出他的國土疆界。偉哉！大眾文學。

六、新興媒體的文學傳播

上述四個在八十五年展現強勢力量的類型文學，主要是從文學出版(publish)的角度來看的，如前所述，文學的傳播還須從其他管道(channel)來看，尤其是在八十五年，文學創作藉由出版之外的其他媒體向外傳播的情形，較諸往年有過之而無不及，異常熱烈，一些作家也因而從以往所擅長的文字（平面）媒體「跨行」到聲光媒體，並且變成「媒體寵兒」(media pet)，享盡「榮華富貴」，也即書因人而紅，人因書而貴，相得益彰，無往不利。

然而，對出版（廣義而言，包括圖書、雜誌及報紙的出版）來說，其他傳

播管道只能說是「輔助性的工具」，蓋作家的創作並不能直接從電視、電台等媒體呈現出來，它們充其量只能作為文字傳播的「第二手傳播」，也即宣傳，例如台北愛樂電台與聯合報副刊的合作，其所扮演的第二手傳播的角色是很明顯的。

或許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文學創作以第一手傳播的態勢直接呈現在電子網路媒體上，就要讓人「刮目」相看了。據稱在八十五年興起的網路詩社的《晨曦詩刊》，在成立短短的五個月內便在網路上累積了千餘首詩作，發表作品的詩人亦高達五十餘位。另外，架設在中山大學的「山抹微雲藝文專業站」也有不錯的表現。新世代詩人直接在網際網路上發表作品，不需經過出版社和文學雜誌、報紙副刊等「守門人」的過濾，展現出一種自由的、開闊的文學傳播空間，它甚至可與那些傳統的守門人所形成的文化霸權相抗衡，這個空間內沒有中心的權威，創作可以自由的出入。此一去中心化(de-concentrate)的文學傳播型態，甚至也瓦解了傳統原有的詩刊。新詩創作在八十五年內也乏善可陳，如果說要有新意的話，其非這些具革命性質的「網路詩」莫屬。

現在，用電腦寫作已不稀奇了，要直接在網路上發表作品才帶勁！

肆、結語

八十五年的文學傳播，可觀察者當不只上述這五點，譬如麥田出版社在學者王德威的策劃下也出版了朱天文的《花憶前身》、鍾曉陽的《遺恨傳奇》、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和蘇偉貞的《封閉的島嶼》等四本質量俱佳的作品，後書和另一位文壇才女蕭麗紅歇筆十餘年復出的《白水湖春夢》，還同獲年度十大文學書的榮銜。此外，像由台南市文化中心主辦的第一、二屆「府城文學獎」，作為首次出現的地區性文學獎，在獎掖、提拔地方性作者及提倡地方文學創作風氣上，有其標竿性的歷史意義，值得記上一筆。但就文學傳播的角度看，總體來說，並不像上述幾點那樣的突出；文學評論的表現亦同。

綜觀上述幾點，可得而言者有二：

(一) 旅遊文學、歷史及傳記文學、同性戀文學這三個文類的表現，在八十五年都是有異於以往的「強勢文類」，從這裏可以發現，文類的強弱會隨著歷史的演變而有不同的展現，如同史詩在近代以來的轉趨沒落而由小說取而代之的情形一樣，以往這三個被歸屬為弱文類一環的文學創作（其中同性戀文學甚至還不能說已成為一個單獨的文類），現今都已躍為主流文類，以至於取得正統的地位，各擁有可觀的讀者。

(二) 表面上看，文類的由弱轉強（或

由強變弱），和讀者（代名詞是「市場」）的接受程度與否密切相關，亦即讀者的接受度越高，該文類就越顯重要，作品的出版量也就隨之增加——至少讀者反應理論（reader-response theories）是接受這樣的看法的。深一層看，這當中還存在一個轉換者機制（transmitter mechanism）的問題，亦即被動的讀者大眾之所以普遍接受某類型作品，其實是來自出版者（當然包括雜誌及副刊的編輯）的鼓勵，出版的編者在某種程度上替讀者決定了該閱讀那些作品或不該讀那些作品，甚至也往上回溯到作者那邊，決定作者的寫或不寫（不出版也就等於未寫），決定作者該寫那種類型的作品；換言之，作品能否流行，能否為多數讀者所接受，一大半的責任都落在使作品從作者藉由它傳播出去的這個「轉換（傳遞）者」的身上。有鑑於此，文學的研究，不只是要從過往專注於作者、作品（文本）之上轉而側重讀者身上，從文學傳播的角度言，更要放在「編者」這個角色上，而文學理論的新發展亦應從讀者反應理論過渡到「編者運作理論」（editor-operation theory）上來。

目前，編者運作理論尚未出現，但是縱觀八十五年台灣文學傳播的概況，讓我們有理由對未來做這樣的期待。希望八十六年又是文學豐收的一年。